

陈学明 马拥军 著

MAKESI

走近马克思

—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
思想轨迹

Carl Marx

東方出版社

陈学明 马拥军 著

MAKESI
ZOUJIN
走近马克思

——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曹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马克思: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

思想轨迹/陈学明等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

ISBN 7-5060-1529-3

I . 走… II . 陈… III . ①哲学思想-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②思想家-人物研究-西方国家 IV . B . 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0732 号

走 近 马 克 思

——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

ZOUJIN MAKESI

陈学明 马拥军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8.5

字数:444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60-1529-3/B·227 定价:32.00 元

前　　言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瓦解,不仅是20世纪的一件大事,而且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苏东剧变以后,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狂潮。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兴高采烈地鼓噪:马克思主义终结了,社会主义终结了,历史终结了;一个新的时代、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开始了。原苏联东欧国家混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内的一批投机分子,曾经从执政党的地位获得好处,现在也面不改色地公然站到马克思主义对立面,加入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合唱。

事实证明,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一点。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拯救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反而使它们陷入更加深重的危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来因为反对社会主义而被掩盖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并日益显出其依靠自身力量无法治愈的症状。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越来越显得底气不足。马克思主义的势力又重新活跃起来。人们逐渐意识到,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决不会收起它狰狞的面目;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原苏联东欧国家也不可能取得辉煌的成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今天的世界,更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从90年代中叶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开始重新组织起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和宣传。与此相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虽然这些政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它们大多声称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的理论来源

之一。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活得很好”。

这期间，西方一些大思想家的动向尤其引人瞩目。法国的德里达、美国的詹姆逊、德国的哈贝马斯、英国的吉登斯，都是在各自领域中卓有建树的大师级人物。可以说，他们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四大思想家。他们的情况各有不同，却在苏东剧变后不约而同地走近马克思，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德里达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苏东剧变以后，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声浪甚嚣尘上的时候，他却毅然举起捍卫马克思的大旗，一再强调“我挑了一个好时候向马克思致敬”；詹姆逊一向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在苏东剧变以后，他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声称“我同马克思的联系出于兴趣”；哈贝马斯幼年曾受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后来又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展开论战，但在形成自己理论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产生了一些误解，在苏东剧变后重新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向世人宣布“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吉登斯作为社会理论家，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在苏东剧变后，他声称“虽然不再时髦，但我仍看重马克思”，并把马克思的某些观点纳入他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中去。为什么四大思想家会在马克思主义处于极其困难的时刻，会不约而同地走近马克思呢？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一个谜，一个无法破解的谜。

本书试图对这四大思想家在苏东剧变后走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作出如实的描述和考察，以帮助人们破解这个谜。

另外，我们在本书中也探究了原波兰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沙夫在苏东剧变后的思想轨迹，以作为本书的一个附录。沙夫在苏东剧变前，因向当时执政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某些质疑，从而受到了各种批判，可在苏东剧变后，在原先那些自称为“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摇身一变，站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之

时,却举起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回击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诬蔑和挑战。“沙夫现象”很值得人们深思。

透过西方四大思想家及其沙夫的眼光,我们将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走近马克思的行为给我们以鼓舞,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弘扬给我们以启发。我们希望,借助他们的视角,能修正某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借助他们的声音,能鼓起那些失望者的信心。

目 录

- (1) 前言
- (1) 第1章 德里达：“我挑了一个好时候向马克思致敬”
- (135) 第2章 詹姆逊：“我同马克思的联系出于兴趣”
- (277) 第3章 哈贝马斯：“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
- (378) 第4章 吉登斯：“虽然不再时髦，但我仍看重马克思”
- (473) 附：沙夫：“我是马克思主义者”
- (541) 结语：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
走近马克思的思想轨迹

第 1 章 德里达：

“我挑了一个好
时候向马克思
致敬”

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马克思的幽灵》

1993年4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思想与社会中心举办了一次大型国际讨论会，会议的议题是：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作的题为《马克思的幽灵》的演讲特别引人注目。

德里达因开启解构理论而在西方思想界享有盛名。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他的解构主义理论广泛地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的后现代主义观点把人们的理智生活推展到一个新阶段。他的一系列概念和方法已构成当今人类知识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德里达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一向以民主左派自居，但他一直认为他的解构主义因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从而与被反缚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中的马克思主义水火不相容。

但就是这个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德里达，这个作为解构主义思想大师的德里达，在苏东剧变后，在不少人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一些原先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也纷纷远离马克思主义之时，却走近马克思，选择马克思，拥抱马克思，为马克思主义辩护。

德里达的可贵之处是在这个时候走近马克思。有人这样戏谑他：“你真是挑了一个好时候向马克思致敬！①”他则马上接着说：“是的，正是时候！”他还申明：“我相信出乎意料的事件的政治品德。”他的意思是他走近马克思确实是出乎他人之意料的，但正是这种“出乎意料”，却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品德”。

无疑，德里达是站在解构主义立场上为马克思辩护的，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一种解构性的阅读重新写过。但我们鄙视那

①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12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种还没有认真挖掘和吸收德里达的真知灼见,就以“这是一种解构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为由而弃之如敝屣的贵族式的态度。在我们看来,面对着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这样一部著作,面对着德里达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话语,首先要做的是并不是细分缕析其正反、优劣,而是找出其不易之论,并用它们来启发人们的思考。我们现在太需要一个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西方思想大师出于“良知”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公正评价,来校正共产党干部队伍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些人的模糊认识。

这里,我们首先摘录《马克思的幽灵》中的若干话语加以评析,然后,具体看一看德里达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揭破福山所传布的西方社会的“福音”的。出于叙述上的需要,德里达的一些话语可能会重复转引。也就是说,在第一部分中曾转引过的德里达的个别话语,在第二和第三部分将再一次转述。

一、《马克思的幽灵》若干话语评析

德里达在其《往返莫斯科》一书中说道,迄今他只要一听到《国际歌》,依然是心潮澎湃,不能自己。^①通读他的《马克思的幽灵》,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部著作正是在这种激情的支配下写成的。这部著作中的许多词句定将成为至理名言流传于世。这里摘录若干,并加以适当评析。

^① 转引自陆扬:“政治和解构——德里达的几本新书”,载《马克思和现实》,1998年第6期,第35页。

—

“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当教条的机器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机构（国家、政党、党支部、工会和作为理论产物的其他方面）全都处在消失的过程中时，我们便不再有任何理由、其实只是借口，可以为逃脱这种责任辩解。没有这种责任感，也就不会有将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①

这段话出自《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的第一章“马克思的指令”。德里达开宗明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的确已是一个摆在和我们同处一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面前的问题了。”^② 诚如他所言，在当今世界上许多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情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诋毁者）都在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德里达经考虑后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幽灵不会消失，马克思主义没有死亡，而且决不会死亡。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称之为“幽灵”，而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精神，所以他又强调“马克思的幽灵”是个复数。本书正文的第一句话便是：“现在该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

①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1 页。

② 同上书，第 23 页。

了。”^① 这段话是在论述为什么要维护马克思的幽灵的过程中说的。

这段话起码包容以下几层值得引起我们深思的含义：

其一，我们必须认真阅读和讨论马克思的著作。对现代人来说，这将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方面的责任。不这样做，就意味着犯有重大错误。他自我检讨说：“就我个人而言，把《共产党宣言》中最为醒目的东西忘得如此彻底，这肯定是一个错误。”^②

其二，我们对马克思的著作的阅读和讨论，必须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他所说的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的研究。他在这里明显提倡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新的学风。苏东剧变后，国外而特别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经院式的研究转换为密切联系实际的研究”。德里达像许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一样，认定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源泉在于同具体实际的结合。

其三，如果说那种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还占统治地位时拒绝阅读和讨论马克思的著作还情有可原，还可以为逃脱这种责任作一些辩解的话，那么，在这种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处于消失的过程之中时，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阅读和讨论马克思的著作了。德里达把苏东的剧变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的机器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机构的消亡，在他看来，这种消亡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来说，是一种解脱。法共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拉札尔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欧代表团说，原来人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制度等同起来，反马克思主义者将苏联制度的弊病归之于马克

^①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 页。

^② 同上书，第 20 页。

思主义，只要一提马克思主义，有些人就看作是为苏联制度辩护；苏东的剧变，使马克思主义甩掉了这个包袱，还原到其本身，现在人们不用再解释苏联的问题了，可以集中注意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了。^① 尽管德里达与拉札尔不是同宗同祖，但在关于苏东剧变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上的观点是一致的。

其四，我们必须阅读和讨论马克思的著作的主要缘由是：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我相信，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在 20 世纪 90 年代说的“没有马克思就没有将来”定将成为一句至理名言而流传于世。他说，《共产党宣言》“那一开始就显露出来的东西乃是一个幽灵。这第一个父亲般的角色，其力量之强大就好像它是一个不真实的错觉或幻影，而实际上，它要比人们轻率地称做活生生的在场的东西更为真实”。^② 现在一些人正借口马克思主义理想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臆想”而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放到“历史的陈列室”去。德里达在这里则提出，马克思主义好像是一个不真实的“幻影”正是其力量强大无比的表现，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远远地超过常被人们轻率地称做“活生生的在场的东西”。

二

“……在我现在不得不加以抵制的所有各种诱惑中，有一种诱惑就是记忆的诱惑，即去叙述我以及我这一代人在我们的整个一

① 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访欧代表团：“访欧纪要之二：欧洲学者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 年第 2 期，第 54 页。

②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 页。

生中所共同享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的几乎慈父般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他的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方式做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为了接受这个明显的事，我们并不一定非要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我们全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有些人享有的是同一种文化，这文化在一种不可估量的深度上仍然保留着这一遗产的标记，不论是以直接可见的方式还是以不可见的方式。”^①

这一段话也出自《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的第一章“马克思的指令”，紧接在上述一段话之后。这一段话具体涉及到了我们究竟要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什么样的遗产。在研读这一段话之前，首先得明确德里达并不是认为对马克思的无论什么样的遗产都得继承。

德里达一方面走近马克思，高嚷“没有马克思就没有将来”，另一方面又再三申言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必须有所选择。他认为，今天的形势与马克思创立自己的学说时的形势相比，已有了天壤之别，因此毋庸置疑马克思的学说中许多东西已过时了。马克思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在活着的时候就警告后人不要把自己的学说当作教条，而应不断地加以变革。他说：“在重读《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其他几部伟大著作之后，我得承认，我对哲学传统中的文本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假如我们思考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有关他们自己可能变得过时和他们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历史性的言论（例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的再版序言中的

^①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页。

论述),就会觉得他们的教训在今天显得尤为紧迫。”^① 德里达在这里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他们自己有可能变得过时,以及他们具有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历史性的论述鲜明地摆在人们面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告诫在今天显得尤为迫切。紧接着他用一连串的反问赞颂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局限性的勇气和精神:“还有哪位思想家曾以此种明白的方式提出过类似的警告?还有谁曾经要求对他自己的研究主题的结论进行变革?不仅出于对知识的逐渐积累的考虑——但这丝毫也改变不了体系的秩序——而且为了能在那里考虑到,另一种考虑,断裂与重构的影响,谁这么做过?还有为了能在任何可能的程序设计之外提前具体体现新知识、新技术、新政治格局的无法预见性,谁这么做过?”^② 应该说,德里达的这四个反问是颇有力度的,通过赞扬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加以变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警告后人要对自己的学说不断地加以变革,关键在于他们认识到,在他们的设计程序之外还会出现他们所无法预见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政治格局,因此他们的思想必然会出现断裂而须加以重构。德里达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政治格局当今终于出现了,全球化趋势就是一例。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显然没有对全球化趋势,对马克思那个时代的铁路和报纸所无法比拟的当今最先进的传媒作过论述。他说道:“传统中的文本没有一个讲清楚了政治正在全球化的方式,讲清楚了在最有创见的思想潮流中技术和传媒对于

①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21 页。

② 同上书,第 21 页。

它们的不可简约性——而这已经远远不只是那个时代的铁路和报纸,对于它们的不可简约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方式作过分析。”^①

马克思的许多学说已失去时效,那么马克思主义中究竟还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继承和推崇的呢?这就是德里达在本段话中所要论述的。他提出,我们这一代人在整个一生中共同享受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的几乎慈父般的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他的阅读文本和阐述世界方式作斗争的方法。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认为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当今仍然是并将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请注意“绝对地和整个地”这一修饰词。他所说的“绝对地”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过时,永远值得我们继承;他所说的“整个地”则是指我们要继承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种方法或那一种方法,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视为马克思主义最本质最有价值的东西,当然不是德里达的首创。早在20年代初,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卢卡奇就在其著名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指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各种研究成果。它并不是指这种或那种信条,也不是指对‘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正统性仅仅是指方法。^② 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他甚至提出,一个人即使接受了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只要他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没有资格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此相反,一个人即使对全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存有异议,但只要他认可

①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②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1年版,第1页。

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有资格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抵上都承继了卢卡奇的这一观点。问题在于，德里达在苏东剧变后重申这一观点，而且是出于一个以研究方法论著称的思想大师之口，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了。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德里达这段话的最后几句。他强调，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绝对地和整个地”正确的“这个明显的事实”，“并不一定非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的意思是，即使像他这样的非马克思主义者、非共产主义者，也会接受这一事实。他的理由是：“我们全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有些人享有的是同一种文化，这文化在一种不可估量的深度上仍然保留着这一遗产的标记，不论是以直接可见的方式还是以不可见的方式。”^①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例如其方法论），已经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不管你是否意识到，它必然会对你产生影响。德里达的这一观点是其论证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主要出发点，也是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最给人以启发之处。

三

“那可能发生的危险就是，有人想在对归于一类的著作（指马克思的著作——引者注）不费力的评注中利用马克思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以便能使政治律令中立化，或者说至少是要抑制政治律令。在这方面，人们能够感觉到在文化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大学里正在流行一种时尚或时髦。在此有什么可担心的吗？为什么要害怕有可能变成一种缓解冲突的动作呢？最近，这种老一套的旧框框注定——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要彻底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参

^①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 页。